



如果能弄到《大公报》旅行记者的身份,到中国西部去旅行,就可以接近红军……
——范长江《我的自述》

从《大公报》记者到革命者

1935年,二十五岁的范长江,在斗室中久久徘徊。一年多来,他接触到来自中央苏区的进步读物,也在国统区处处听到“剿匪”的宣传。孰是孰非?真相如何?他下定决心:前往天津《大公报》社,寻找答案。

在天津《大公报》社旧址,范长江长孙范博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九十一年前,我爷爷就是从这里出发,踏上他的西行之旅,走入《大公报》之前他是个有理想的青年,出来之后,他就是一名探寻真理的记者,而我很想知道的是,他如何带着一身孤勇,走上这样一段义无反顾的旅程。”

1935年5月,范长江争取到《大公报》特别通讯员的身份,从天津出发,一路西行。十月光阴,六千里长路,他突破白色恐怖、军事围剿;踏入天险绝境,踽踽独行,追寻着红军足迹,也走近了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战略转移——长征。

在天津图书馆,在数十万册近代新闻刊物中,范博寻找着祖父当年留下的文字。

1935年9月13日的《大公报》上刊出了《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》。经过四个月的探寻,范长江落笔成文,标题里仍有“剿匪”二字,可在文章中,他十二次写下“红军”。“红军”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国统区公开刊物上。

范博说:“能够看出爷爷当时是比较谨慎的。他可能还没有非常深刻地了解红军的主张到底是什么,但实际上内心的想法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了。”

“匪”与“红军”,一念之间,背后是一个青年记者在时代夹缝中的判断与抉择。范长江翻雪山,跨戈壁,伪装成商人、书生、郎中、脚夫。一路上,他对红军的认识,也从最初的好奇、疑惑,逐渐转为理解和钦佩。他在文章中写道:

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牛羊予一般农民,反对捐税,反对派款,取消民众的负担,增加民众的所有。

前锋至时,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,先锋乃攀铁索而进。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所慑。

他们始终不畏缩,能团结十万人成钢铁般的力量,如果说这是“土匪”,那中国竟有如此众多的优秀“土匪”,

应当是中国的荣光!

范博说:“那时,爷爷看到了山河破碎,看清了老百姓所期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,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——中国共产党主张的这条革命道路,就是中国的出路。1939年,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从一个追寻真相的记者,真正地成为一个革命者。他用文字的力量,写出了真理,写出了信仰。”

清凉山上灯火不熄

信天游的调子漫过黄土坡。范长江在西北大地上追寻到的真理,凝结为《中国的西北角》《塞上行》,他让无数爱国青年看到,在山河破碎的中国,还有一片充满生机与理想的土地。

“到延安去”,成为许多青年共同的选择。1937年至1945年间,四万多名进步青年冲破封锁,来到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。

他们中的许多人,把笔和信念一同带进了延河畔的清凉山。在彻夜长明的油灯下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新闻事业,开始扎根、生长。

一台斑驳老旧的对开铅印机,静静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。它身上的每一道磨痕、每一个零件,都连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来路。

抗战时期,为躲过敌人封锁,它被精密拆解,分装进三口棺材,穿越千里封锁,从上海秘密运抵延安。来到清凉山后,它成为党中央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的印刷重器。

而这台来之不易的机器,也见证了1942年春日一场影响深远的新闻工作改革。

孙春鹏,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师,2006年硕士毕业后,他怀揣着向往,来到延安,扎根教研一线。十三年前,他开始教授《延安新闻事业史》,也走进了八十多年前的这场新闻工作变革。

孙春鹏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《解放日报》办报的理念从版面的设置上来讲,参照了当时苏联的《真理报》等一些报纸的做法,‘一国际 二国内 三边区 四地方’,很多头版的消息都是国际消息。1942年2月份的时候,党中央制定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,按照这个版面的安排,只能排在第四版……这样的安排,没有能够突出反映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党的重要政策,也没有做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。”

报纸办给谁看?文章写给谁读?新闻工作到底为了谁?

1942年3月31日,一场关于《解放日报》改版的座谈会召开了,七十多位与会人士各抒己见,最终明确:共产党的路线,就是人民的路,党报要深入群众,不尚空谈。

这一晚,清凉山上灯火不熄。编辑打磨文稿,工人铸字排版。那台历经千里突围而来的铅印机,再一次全速轰鸣。

晨曦破晓,改版后的《解放日报》如期面世。

这一天的社论《致读者》,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使《解放日报》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,文中还写道:

报纸的任务,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、喉舌,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。

这里的“他们”,正是人民群众。

孙春鹏说:“报纸突出的位置,就是要刊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和报道,强调与群众相结合,走群众路线,如实地反映群众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意愿,大量地报道生产战线的劳动模范。这样就彻底改变了闭门造车编写稿件的做法。应该说这是我们党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”

“希望我的笔是一支桨”

一纸革新,春风遍野。

一个月后,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,会议提出,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,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。鲁艺师生走向田间地头,走向村庄院落。《兄妹开荒》的秧歌声里,唱出边区群众的生活;《白毛女》的悲欢,也在人民的苦难与觉醒中“生长”出来。

1944年,一位同样渴望用文字服务人民的青年,受到延安文艺热潮的影响,从晋察冀根据地来到延河畔,他

就是孙犁。在鲁艺求学期间,他扎根生活,观察民情。1945年5月15日,孙犁的短篇小说《荷花淀》发表于《解放日报》副刊,不足五千字的篇幅,没有硝烟弥漫,却在朴实生动的文字里,以白洋淀水乡为底色,写下了抗战时期民众的觉醒与担当。

《孙犁传》的作者苑英科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,文艺工作者走出了书斋,到群众当中去,把火热的抗日生活,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。孙犁他描写的是什么呢,是敌后人民群众的抗日生活。他说,心地光明就有灵感,人情入理就成艺术,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情,入广大人民群众的道理,而不是人你作家个人的理。这种文字力量,特别能够鼓舞群众,是联结党和人民群众不可替代的重要纽带。”

孙犁曾写道:

希望我的笔是一支桨,摇动在民族解放的河流上。

这支桨,始终朝着人民的方向。

1948年冬,解放天津的炮火即将打响,遵照组织安排,孙犁奔赴天津参与创办《天津日报》。从延安的“小鲁艺”走向人民的“大鲁艺”,他将长期的实践与积累,扎根群众、服务人民的初心,带到津沽大地。

微观镜头下,一枚铜模,刻下了一个城市的名字——“津”。它曾起落万次,见证旧时代的纸页纷飞,也为新时代落下第一笔铿锵。1949年1月17日,第一张《天津日报》迎着晨光问世,见证这座城市的蓬勃新生。

时代奔涌,笔墨常新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大潮涌动,时代变革,呼唤新闻宣传再次突破。此时,一个改善百姓生活的细节,让时任《天津日报》总编辑的石坚,产生了新思考。

天津日报社原总编辑邱允盛回忆这段历史时说:“当时老百姓吃鱼也要凭票供应,更别说能吃上新鲜的活鱼了。因此市政府在那个郊区建了几个水产养殖基地,在市区也建立了活鱼供应点,居民们兴高采烈,这个事情在编辑部反应也挺强烈的,还提出了新闻报道也要抓活鱼,记者应该都深入到基层去,到一线去,‘抓’一些新人新事。”

在石坚的带领下,邱允盛和同事们深入城乡基层,捕捉改革故事、民生百态,聚焦个体户创业、企业改革等鲜活题材。1979年,一篇仅有四百字的报道《光棍堂飞进四只金凤凰》应运而生,讲述了蓟县一家四个未婚青年,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脱贫成家的事,小文章大背景,字里行间流动着改革的力量。

邱允盛回忆说:“这篇稿件报道以后,成了读者中的一个美谈,在当年中国好新闻评选中获得一等奖。新闻就应该抓住生活中有代表性、生动活泼的事实,让人感觉有新意,让人感到有启发,能给人以力量。”

范博的寻访,终于找到了答案。

只有忠实于事实,才能忠实于真理。

今天,“长江”二字,成为中国新闻业至高荣誉。

支撑这份荣誉的,是新闻工作者最朴素也最坚定的选择——保持人民情怀,记录伟大时代,讲好中国故事,传播中国声音。

使命如炬,理想如光。

